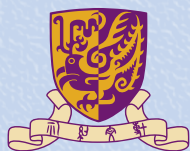


可否消灭贫穷？ 近二百年来贫穷面貌的变化

刘凯 王卓祺

香港
亞太
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可否消灭贫穷？

近二百年来贫穷面貌的变化

刘凯 王卓祺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亚太研究所

引用本文

刘凯、王卓祺。2020。《可否消灭贫穷？近二百年来贫穷面貌的变化》。取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网站：http://www.hkiaps.cuhk.edu.hk/wd/ni/20201110-115317_2_op243_s.pdf

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专论第 243 号

作者简介

刘凯博士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副教授。

王卓祺博士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 刘凯、王卓祺 2020

ISBN 978-962-441-243-7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可否消灭贫穷？

近二百年来贫穷面貌的变化

1 问题的提出

贫穷问题由来已久。自 1760 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出现以来，整个世界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首先是欧美国家经济起飞，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上升；二战之后亚洲的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也跻身富裕社会；而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短短 40 余年已经从一穷二白的经济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直至今日，欧美各国仍然在谈论贫穷问题，包括对儿童、老人及妇女等群体贫穷问题的关注；至于发展中国家，贫穷问题更是挥之不去。如此看来，经济发展未必能消除富裕经济体对贫穷的关注；那么，我们会问，发展中国家理论上拥有后发优势，它们能否避免陷入贫穷的陷阱呢？世界各国的贫穷问题可否被消灭呢？

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解开这个迷团。我们认为透过跨时空的历史研究，才可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有较可靠的理解。以人类对历史的研究而言，二百年不可以说是足够的

时间长度；但就大规模贫穷问题的历史起源而言，二百年已经覆盖现代社会对贫穷问题的系统性关注。因此，我们采用英国的典型案例，描述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年代至1830、40年代）后的贫穷面貌，再与今天的富裕及落后国家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到跨时空的贫穷面貌异同之处。

跨越时空的比较，尤其需要注意概念的一致性。在1830、40年代，贫穷问题研究还在描述性层次，并未发展出科学及系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今天，“收入”普遍成为量度贫穷的尺度，但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关键问题，即收入本身只是抽象的数字，只能概括贫穷的实况。因此，只有将生理或生存性物质匮乏作为观察及量度贫穷的指标，才能还原贫穷的面貌。在这个研究思路下，本文结合贫穷概念及其量度方法的历史变化，从贫穷“可否消灭”的主题开展对贫穷面貌变化的研究。这样做便可以弄清楚究竟今天与近二百年前贫穷面貌的变化，是因为人们对贫穷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还是因为我们用的量度方法不同？

如今，消灭或是减少贫穷成为各国及国际组织追求的社会目标。世界银行在2013年的宣言提出要致力消灭极端贫穷，具体目标是到2030年使全球生活在极端贫穷线（*extreme poverty line*，每人每天生活费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降至3%，并通过扶持发展中国家处于底层的40%人口，令其收入增长以促进共享繁荣（World Bank, 2013:2）。联合国在2015年9月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亦要在2030年消灭贫穷。此外，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发展中国家多次展开反贫穷运动。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从1990至2015年，全球极端贫穷人口已由19.26亿大幅减少至8.36亿人，同期的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率也由47%降至14%（United Nations, 2015:4）。

各国中，贫穷人口减幅最大的莫如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目标之一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穷现象。将“反贫穷”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中国政府力图通过举国动员消灭绝对贫穷。统计数字显示，在2017年底，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0年，中国的累计减贫数字是7.4亿人（央视网，2018）。

基于此，我们展开如下的探讨：贫穷究竟可否被消灭？各国和国际组织努力消灭的是否是同一种贫穷？他们对贫穷的定义与测量是否一致？这一探讨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从过去二百年的时间维度了解全球贫穷面貌的变化。

第二，追本寻源，厘清消灭贫穷是何所指，即贫穷的概念及其量度方法。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对同一概念可能有不同的演释，即由于背景的变化而产生新的理解；亦有可能由于时空的变化，原有概念蜕变成为另外一个概念。同时，贫穷概念的蜕变还体现在量度贫穷方法的改变。因此，我们要详细描述不同的贫穷概念及其所采用的量度方法。

第三，选择性地介绍富裕经济体及个别国家、地区的贫穷面貌，包括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或OECD）成员国、美国、中国香港及中国大陆。它们各有特点：欧盟的贫穷概念及量度方法的演变带有领导性，是富裕经济体贫穷面貌及贫穷概念质变的体现；美国的贫穷面貌则表现其特殊性，使我们对贫穷面貌有崭新的认识；至于香港这个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处于领先地位的小型富裕经济体，也体现出独特的贫穷面貌；中国大陆在过去40余年的贫穷面貌及量度方法有极大的变化，可以体现贫穷量度的多元性及多层次问题。

第四，回答“贫穷可否消灭”的问题。这体现了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对贫穷概念及量度方法的挑战，答案的关键在于贫穷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内涵。

2 近二百年来自全球贫穷面貌的变化

本文首先追溯工业革命发生二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变化，对贫穷发生、贫穷认知和反贫穷进行历史维度的梳理，以期对能否消灭贫穷有更清晰的认知。

近二百年以来，全球贫穷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体现绝对贫穷在全球依然存在，尤其是仍大面积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贫穷的关注重点已由绝对贫穷转向相对贫穷。

2.1 绝对贫穷挥之不去

西方的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近代的工厂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有效地集中工人进行大规模生产，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并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劳工剥削和环境污染问题，而穷人当然首当其冲，既是得益者，又是受害者。英国作家 Charles Dickens 于 1838 年出版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讲述了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市场利用童工的辛酸故事。工业革命不仅造成了工厂大量使用童工的凄惨景况，它的剥削性更波及整个社会，尤其是穷人。英国北部工业城市索尔福德（Salford）一所医院的医生 John Morgan，于 1865 年有如下的观察：城市里的穷人明显缺乏耐力、肌肉发育不良、贫血、神经系统发展不平衡、牙齿蛀烂、皮肤乾裂、蓬头垢面（Morgan, 1866:5-7）。贫穷是陷入生存的危机。除了食物之外，安全

的饮用水至为重要。但根据英国学者 Frederick Cartwright 的描述，1830 年时英格兰的大工业城市中没有一个有安全的饮用水供应；最典型的例子是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由于严重污染发出恶臭，以至旁边的议会大厦在开会期间也不能打开窗户 (Cartwright and Biddiss, 2004:112)。

贫穷研究也始于英国，最为典型的当推 Charles Booth。他于 1886 至 1888 年在伦敦东部地区进行调查，发现 35.2% 的居民陷入贫穷（包括 12.5% 非常贫穷和 22.8% 贫穷），人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食物极其粗糙 (Booth, 1892:3, 35, 38, 62)。Seebohm Rowntree 于 1899 年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调查，亦发现近三分之一 (27.8%) 人口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 (Rowntree, 1901:120)。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工业革命先行者的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至 1830、4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即使已经处于经济繁荣及综合国力上升之际，仍然不能摆脱贫穷。

我们再看看近几十年来的减贫成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在 1990 至 2015 年期间，平均每天有 12.8 万人脱离极端贫穷状态 (Roser, 2016)。这是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考虑到近二百年来全球人口增长了七倍 (联合国, 2020)，但穷人的比例仍不断下降，这说明该成就主要还是得益于经济发展。若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会产生更多穷人。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90 年全球极端贫穷人口占 35.9%，即近 19 亿人；随着经济发展，2015 年生活水平低于每天 1.90 美元的极端贫穷者只有 7.3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0.0% (World Bank, 2018:2)。

但同时，全球部分地区仍存在大面积的贫穷现象。牛津大学学者 Sabina Alkire 和 Bouba Housseini 利用多维贫穷指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于 2014 年搜集了撒哈拉以南非洲 24 个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6.45 亿人口中，

有2亿人(31.1%)处于“一无所有”的赤贫(*destitute*)状态。这个“一无所有”的贫穷是什么意思呢？牛津大学的报告从多方面进行了赤贫人口的描述，包括：

- (1) 60.9% 有丧失两位或以上的儿童的遭遇；
- (2) 超过一半有至少一位家庭成员严重营养不良；
- (3) 53.0% 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入学超过一年；
- (4) 63.4% 没有任何的基本资产，例如单车、收音机、电话、电冰箱、电视机、电单车、汽车或货车；
- (5) 71.0% 未能获得安全饮用水，或水源地来回程步行超过45分钟；
- (6) 93.3% 没有电力供应；
- (7) 99.6% 使用固体燃料（粪便、木柴或炭）煮食（Alkire and Housseini, 2014:2, 7-8）。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赤贫与百多年前英国医生 Morgan 对穷人的观察相去不远，都是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状态。当然，Alkire 和 Housseini 的多维贫穷指数更适合量度最欠发达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赤贫。例如，其中的一些指标如“曾有儿童死亡”、“使用粪便、木柴或炭煮食”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总之，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增长时期的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是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生存型的极端贫穷都相伴相随，挥之不去。

2.2 相对贫穷引起关注

富裕经济体量度贫穷的方法与其对收入分配平等性的关注息息相关，相关数据的搜集及分析方法源于 Anthony Atkinson、Lee Rainwater 和 Timothy Smeeding 在 1990 年代中期的努力（Atkinson, Rainwater and Smeeding, 1995）。那么，在富裕经济体，什么是贫穷呢？欧盟和经合组织以各国本身

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五成（经合组织标准）或六成（欧盟标准）作为贫穷的切线，切线标准之下便是贫穷。无论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五成还是六成，相对贫穷群体是指经社会转移（social transfer，即税收及社会保障等现金转移）后，可支配相等收入（equivalised disposable income）低于这些标准之下的人口。

自2001年欧盟拉肯（Laeken）峰会以来，在欧洲的相关讨论中，贫穷的概念被加上“风险”（at-risk-of）修饰语，形成了“贫穷风险”（at-risk-of-poverty）一词。表面上，此修饰语似乎暗示了对一个人变穷的潜在可能性的概率分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该修饰语的加入实际上是受当时政治动机的影响，因为各国在如何将复杂的多维贫穷概念转化为单一指标方面具有很大分歧（Decancq et al., 2013）。欧盟随即承认了贫穷风险概念，并将贫穷切线由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五成上调至六成，形成了“贫穷风险线”。

计算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五成或六成，事实上是在量度不平等，即相对贫穷线（50%）或贫穷风险线（60%）之下的住户收入与整体社会一般收入的差距，而不一定是贫穷。由于这个社会指标并不量度资产（它只量度收入）或贫穷（它量度相对于社会整体中位收入的距离），这条相对贫穷线或贫穷风险线只可用于富裕经济体。而在一些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于相对贫穷线的家庭大有可能面对绝对贫穷的景况。

此后，由于欧盟在2004及2007年两次扩大成员国（分别涉及十国和两国，主要是东欧国家），以收入量度贫穷及不平等的指标已经不能反映各成员国生活条件的多元性。因此，欧盟的社会保护委员会（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于2009年在已达成共识的社会指标组合中加入了对“物质剥夺”（material deprivation）的测量，制定出九项物质剥

夺指标，用以补充将收入的货币单位作为贫穷量度工具的不足，这些指标包括住户没有能力：

- (1) 在过去 12 个月内支付按揭、租金、水电费或贷款；
- (2) 使房间足够温暖；
- (3) 应付突然出现的开支（等于贫穷风险门槛所设定的每月平均开支）；
- (4) 经常（指隔日）食用肉类或蛋白质；
- (5) 负担（每年一星期）外出度假；
- (6) 拥有一部电话；
- (7) 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
- (8) 拥有一台洗衣机；
- (9) 拥有一辆汽车（Decancq et al., 2013:10）。

这九项物质剥夺指标考虑的是人们有需要但不能负担的情况，即排除不需要或没有要求的情况。缺乏其中三项即被定义为物质剥夺，缺乏四项则属严重物质剥夺（Decancq et al., 2013:10, 23）。从理解贫穷的传统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物质匮乏并不完全反映基本人类需要，即生存所需的足够食物、保暖衣服及安全的遮蔽所。虽然第 1、2、4 项仍然带有基本人类需要的成分，但度假、电话、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商品形式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生存所需的资源及社会功能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在现代的高收入信息社会，缺乏一部智能手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物质匮乏的社会指标。

在极端贫穷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贫穷的关注点已由绝对贫穷转向了相对贫穷，即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不再是生理性或生存型贫穷，而是将贫穷归因于社会

性，视为社会不平等，政策取向上主要是预防人们陷入具有社会不平等含意的相对贫穷。

3 贫穷概念及量度方法的时空变化

跨越二百年时空维度来谈论脱贫、灭贫，我们对比较上的困难应该十分小心，这包括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对同一概念但其是否有相等功能意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理解（Niessen, 1982）。举例说明，约二百年前全球最富有的犹太裔银行家 Nathan Rothschild 死于缺乏杀灭传染病病菌的抗生素；今天抗生素只值几元钱，只有非洲“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才没能力购买。相距时空二百年，究竟贫穷的意义有什么转变？我们是否在讲述同一意义或同一概念的贫穷呢？此外，不同的贫穷线测量出的贫穷状况也会大不相同。美国设计国家贫穷线的官员、经济及统计专家 Mollie Orshansky（1969:37）曾经这样形容贫穷：“贫穷，如美丽，各花入各眼”。接下来我们从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的定义和测量来探讨这一问题。

3.1 绝对贫穷的定义与测量

若将贫穷概念理解为人类的生物性（biological）或生理性（physiological）生存需要，理应不复杂，且客观上是可以验证的。如果物质的匮乏会造成生理损害，如营养不良甚至死亡，这就是绝对或极端贫穷，即赤贫或“一无所有”的概念。

Booth 在 1880 年代对伦敦贫穷问题的大规模调查，及 Rowntree 随后对约克郡进行的贫穷调查，均把贫穷指向绝对

的物质匮乏。Booth 将贫穷直接定义为所在国家的人们虽然有固定收入，但是收入较低，例如一个中等规模家庭每星期 18 至 21 先令，并且他们的谋生手段不足 (Fried and Elman, 1969)。Rowtree (1901:111) 将贫穷定义为“当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理消耗所需即为初级贫穷”。

即使大家普遍接受贫穷是一种生存型的绝对贫穷，但对于如何测量绝对贫穷仍存在诸多技术问题。例如，是根据收入还是根据消费进行测量？是根据单一货币化维度进行测量还是根据更加宽泛的物质剥夺维度进行测量？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测量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测量？例如，牛津大学学者 Max Roser 曾估算近二百年来全球贫穷人口的规模。他引用经济学者 François Bourguignon 和 Christian Morrisson (2002:731, 733) 的资料，采用了世界银行于 2015 年调整的最新极端贫穷标准，即基于 2011 年恒常国际元（即美元）每天 1.90 元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¹ 假设历史资料可靠，1820 年全球人口规模估计有 10.6 亿，其中有 94.4% 属于极端贫穷；若同样依据 Bourguignon 和 Morrisson 的资料，但用 1.00 美元而非 1.90 美元作为判断依据，极端贫穷人口比例便由 94.4% 下跌至 83.9% (Roser, 2016)。可见，不同的贫穷量度尺度得出不同的贫穷人口规模及比例。

由于基于收入的衡量标准常常忽略了资产和储蓄，部分短期收入较低者可以通过资产和储蓄维持高消费，因此当前总支出可能比当前收入更为真实。但只要收入的参考期不会过短，基于收入的衡量标准就不会产生误导。然而，贫穷线

1. Bourguignon 和 Morrisson (2002) 是基于 1985 年购买力平价每天 2.00 美元计算 1820 至 1992 年的贫穷情况。

是基于收入还是消费来设定的问题不仅要考虑合理性，更应该考虑现实性。从务实角度来看，在发展中国家消费数据更容易搜集，但是在发达国家则收入数据更容易搜集。因此，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使用不同的贫穷线，既是基于本国实际的贫穷情况，又是基于数据可得现实考虑。

从货币化的维度看，贫穷线的确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预算标准法（Budget Standard，又称市场菜篮子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内容包括维持社会认定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的必需品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拥有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现金数量。

第二，“一天 1.00 美元”法。1990 年，为了比较各国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对 34 个有贫穷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的贫穷标准进行了研究，发现六个最贫穷国家的贫穷标准集中在 275 美元至 370 美元之间，因而它采用了 370 美元作为衡量各国贫穷状况的国际通用标准（World Bank, 1990:27-28）。按 198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年 370 美元的高贫穷线很快被简化成“一天 1.00 美元”的贫穷标准。1994 年，世界银行重新对贫穷标准进行了研究。按 1993 年购买力平价测算，十个最贫穷国家的平均贫穷线约为每天 1.08 美元（Roser and Ortiz-Ospina, 2013）；世界银行按此标准重新测算了各国的贫穷状况。2008 年，世界银行以 2005 年的物价指数为标准，将国际贫穷标准提高到“一天 1.25 美元”，并在 2015 年进一步提高到“一天 1.90 美元”（Cruz et al., 2015）。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高收入国家如果也采取最贫穷国家的贫穷标准，便显得不合时宜。因此，2017 年底，世界银行提出用两条美元价值较高的贫穷线，分别为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每天 3.20 美元及适用于中高收入国家的

每天 5.50 美元，并为此对全球贫穷作出不同的评估（World Bank, 2018）。

第三，恩格尔系数法。恩格尔（Ernst Engel）为德国统计学家。他的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开支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随着收入增加，家庭开支中分配给食物的比例会下降，而食物开支中外出餐饮的比例会逐渐增加。他因而计算了家庭总开支中食物开支所占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值愈大，说明该地区民众总开支中用于食品消费等基本生活开支的比重愈高，相应的民众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基本生活边际消费倾向愈高；因而用于其他结构提升型消费或投资领域的比重愈低，民众的生活水平愈低，反之则说明愈高。对于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贫穷程度，恩格尔系数是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指标之一。根据满足生活需求的最低营养摄取标准确定食品消费项目和数量，计算出饮食费用，并用它除以计算期最低收入水平组的恩格尔系数，即可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线。其中，食品的基本消费额可以根据生活必需的食品和项目及最低需求量来测定，也可根据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来进行测定。

尽管这些标准为大众普遍熟知，但对于绝对贫穷的测量是否准确仍存争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评论员 Jason Hickel（2015）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灭贫预测提出批评，他认为每天 1.90 美元并不足够维持基本人类生存需要。如上文所述，这条国际绝对贫穷线的设计始于 1990 年，当时是 1.00 美元，折算为当地货币在当年具备可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恒常能力。Hickel 引述美国农业部的估算，2011 年美国人每人每天要用 5.04 美元才能维持最低食物需要，且不包括居住及衣服需要；而在印度，一个儿童若

用每天 1.90 美元换成当地货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会有六成机会发生营养不良。

用美元或其他货币单位作为量度购买力的方法，只是量度贫穷的代替品，是一种间接的测量，而不能直接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真实需求。因此，使用多种维度来定义和测量贫穷的方法逐步被发展出来。不同于货币化的定义，联合国对绝对贫穷的定义超越了生存必需的物质层面，包含了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1995 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举行“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与会国发表的宣言中将绝对贫穷界定为：人类基本需要被严重剥夺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住所、教育和信息，它不仅取决于收入，也在于获得服务（United Nations, 1995）。

世界银行对贫穷的定义则进一步超越了联合国的定义，强调“有尊严地获取”，甚至包含政治参与等维度。2003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将贫穷定义为：“福祉”的剥夺是多维度的，其中包括低收入和无法有尊严地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商品与服务。贫穷还包括低水平的健康和教育程度，没有机会获得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人身安全不足，政治性声音不足，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和机会不足，因而难以过上更好的生活（World Bank, 2003）。

其中，牛津大学的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中心主任 Sabina Alkire 的多维贫穷测量被广泛应用，其思想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martya Sen。Sen（1992）认为贫穷是多维的，不仅表现为收入的贫穷，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指标的贫穷，但一直以来难以测量。Sabina Alkire 和 James Foster（2008）提出了一种集贫穷识别、加总和分解于一体的方法，即 A-F 计数测量法（Alkire-Foster method 或 AF method）。该方法既满足了测量公理性的要求，也具有

较强的现实和技术方面的可操作性，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量使用。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进一步将绝对贫穷的定义发展为三个同等权重的维度，即健康、教育及生活水平，共计十项匮乏指标，每个维度的最高分数为3.33，最高总分数为10，若一个家庭的匮乏总分数是3分或以上，即有二至六项匮乏指标，便会被界定为多维贫穷（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0:95, 221）。

此外，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学者 David Gordon 从儿童贫穷的角度研究了联合国关于绝对贫穷定义的量化问题。他将儿童的绝对贫穷量化为八项与基本生存需要相关的严重匮乏（severe deprivation）指标，并设定遭受两项或以上即构成绝对贫穷。这八项指标分别为：

- (1) 食物：身高或体重在国际参考人口平均值的负3个标准差之外；
- (2) 安全饮用水：饮用地面水，或步行需时30分钟或以上才取得安全饮用水；
- (3) 卫生设施：家中或附近没有任何形式的厕所设施；
- (4) 健康：从未接种任何预防疫苗，或近期曾患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腹泻但没有获得治疗；
- (5) 住房：每房间居住五人或以上，或住房没有地板材料（如是泥地）；
- (6) 教育：儿童（7-17岁）从未上学，或目前没有上学；
- (7) 信息：儿童（3-17岁）不能使用收音机、电视、电话、报纸或电脑等媒体；
- (8) 获得服务：不能获得教育或医疗等基本服务（Gordon and Nandy, 2012:61-62）。²

2. Gordon 等（2003:33-34）在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贫穷时，

Gordon 的八项指标加入了社会需要层面的教育及信息等指标，基本上已经超越传统对贫穷概念的理解，即生理性的人类生存需求（如食物能量、保暖衣物及遮蔽所等）。这个新的意义理解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反映人类社会福祉概念和测量随着时空而改变。当然，这个转变的前提是我们处于现代社会，经济具备发展的普及性与持续性。

3.2 相对贫穷的定义与测量

到了富裕社会，人类的需要已经不再限于生理层次，相对贫穷的概念相应而生，并脱离物质条件匮乏的概念约束，最终演变成生活方式的选择。即是说，相对贫穷有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缺乏基本生存资源的状态，而是生活方式与社会平均水平有差距，或可说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衡量标准。

相对贫穷最典型的定义，可以引用英国社会政策学者 Peter Townsend (1985:660) 的界定：“当一个人缺乏所需的资源，进而获得的日常饮食类型、参与的活动，以及拥有的生活条件和设施，是其所属社会至少被广泛鼓励或认许的，便可以说这个人处于贫穷状态。” Townsend 认为，作为比较富裕的福利国家，英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仍然存在贫穷问题，这并不代表英国扶贫政策的失败，而是因为贫穷是随着社会规范和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的，是一种相对剥夺 (Townsend, 1985:661-62)。很明显，相对贫穷是一种社会认许的生活方式的最低标准 (minimum standard)，但这个社会最低标准与物质匮乏不一定有关系。这个定义与欧洲共同体理事会

曾采用如下“获得服务”操作定义：居所 20 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形式的学校，或 50 公里以内没有任何有医生的医疗设施。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于 1975 年对贫穷的界定相似：“受贫穷困扰的人（个人或家庭），他们拥有的资源缺少到被排斥于他们居住会员国家（指欧洲共同体）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之下。”（Decancq et al., 2013:3）

在 1960 年代初，Townsend 已批评发达国家的贫穷研究犯下如下两点错误：第一，狭窄地理解贫穷为难以维持生理需求，这是假设个人的生理效能（physical efficiency）能够与他们的心理福祉、社会组织及结构分离；第二，列出一系列“生存必需品”，并转化为收入，应用于不同时间和空间，好像一个固定的标准可用于量度不同人群，不管这是在 1900、1930 或 1950 年，以及不论在约克郡、伦敦、西西里或加尔各答（Townsend, 1962:218–19）。Townsend 想讲的是什么呢？他揭示了贫穷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概念。正如他举例说明，人类并非如鲁滨逊漂流荒岛那样可以独立生存，而是一张关系网（工作、家庭、社区等）的参加者。人类的需要应包括反映社会合适行为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随着环境改变而有所不同。他同时引述 Adam Smith 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的说法：“关于必需品，我认为除了维持生命的物品外，还包括根据当地习俗缺之便不恰当的东西——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升斗小民（indecent for creditable people, even of the lowest order）。”（Townsend, 1962:219）

从社会规范角度，贫穷非纯粹生存风险，而是涉及不分阶层的、社会认可的行为所需要的必需品。正如匈牙利裔美国经济学者 Tibor Scitovsky（1978:116）对发达国家使用高水平贫穷线原因的解释，是在于贫穷规范（poverty norm）的改变——“在发达国家，贫穷规范很久以前已不再反映生理性的最低生存需要，并且已成为一个‘尊严的最低社会标准’（minimal social standard of decency）。”

然而，若完全采用社会规范视角，很有可能遗忘贫穷的绝对内涵，即生物性或生理性需要，进而改变贫穷的意义及性质。这个情况尤其容易出现于以收入衡量相对贫穷的富裕经济体。在1980年代，Townsend（1985）与Sen（1983）便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贫穷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内涵，即Scitovsky所言的生理性最低生存需要；若贫穷定义没有这个“绝对”内涵的话，便难于与社会不平等有所分辨。

此外，欧盟还采用比贫穷更加宽泛的概念——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欧盟订立的2020年目标（Europe 2020）以及当前的欧洲贫穷语境中，贫穷常常是与“社会排斥”有关。社会排斥是比贫穷更笼统和模糊的概念，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04:10）将社会排斥定义为这样的过程——“某些人由于贫穷、缺乏基本能力和终身学习机会，或遭受歧视而被迫落入社会边缘，并被阻止充分参与。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近权力和政策制定机构，因而常有无力感，且不能控制那些影响其日常生活的决定”。然而，社会排斥概念难以进行操作化和测量。

关于相对贫穷的测量通常采用比例法。最为常见的是平均收入比例法，上文谈到的相对贫穷线（经合组织）和贫穷风险线（欧盟）便是一例。这种方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线。这里的收入指的是经社会转移后的可支配相等收入，其计算方式是找到一个处于该国家或地区所有住户收入分布的中间点且包含在职成人的那一户，计算该住户的可支配相等收入，以反映整体社会实际进行经济活动的成人所代表的收入模式。这种贫穷定义方式对不平等及贫穷比较研究的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选择用住户收入而非开支模式，基

于收入反映个人及家庭参与主流社会的能力，而非其消费行为；二是利用相等收入以反映不同规模家庭的收入需要。

比例法的另一种形式是收入等份比例法。这种方法首先把住户按收入高低分成几个（通常是五个或十个）等份，并确定总人口中贫穷人口所占的比重（通常为 5% 或 10%），得到最低收入住户贫穷线。和平均收入比例法相比较，这种测量方法较为简单，因而易于操作和计算。

4 富裕经济体及个别国家和地区的贫穷面貌

4.1 欧盟及经合组织的贫穷情况

若用欧盟社会保护委员会的严重物质剥夺指标（定义见上文）来量度，2016 年欧盟 28 个国家的贫穷率平均是 7.5%，其中瑞典只有 0.8%，希腊则有 22.4%，东欧的保加利亚更达 32.0%（表 1）。

若以欧盟的贫穷风险线（住户收入中位数的 60%）来量度，欧盟 28 个国家平均是 17.1%；其中丹麦有 11.9%，但希腊及保加利亚则分别有 21.2% 及 22.9%（表 1）。

若用经合组织的相对贫穷线（住户收入中位数的 50%），丹麦只有 5.8%，瑞典有 9.1%，希腊亦只有 14.4%（表 2）。这组数据比贫穷风险线要低得多。

若加入市场收入作对比，便可知道社会转移的效果。以 2016 年为例，澳大利亚的相对贫穷率由市场分配下的 25.2% 跌至社会转移后的 12.1%，日本则由 33.0% 降至 15.7%（2015 年）；韩国没有什么社会转移，仅由 19.8% 降至 17.6%。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希腊，市场分配下的贫穷率是 33.3%，社

表 1：欧盟国家的贫穷率，2016 (%)

国家或地区	严重物质剥夺指标 (4项或以上)	贫穷风险线 (住户收入中位数的60%)
欧盟 28 国	7.5	17.1
瑞典	0.8	16.2
丹麦	2.6	11.9
德国	3.7	16.5
克罗地亚	12.5	19.5
匈牙利	16.2	14.5
希腊	22.4	21.2
保加利亚	32.0	22.9

资料来源：Eurostat (2020a, 2020b)。

会转移后则只是 14.4%。北欧的挪威及瑞典，社会转移后相对贫穷率仅为个位数，分别为 8.2% 及 9.1% (表 2)。

若以 65 岁或以上的退休年龄人士来分析，社会转移前，澳大利亚市场收入计算的贫穷率为 64.9%，社会转移后降至 23.2%。欧洲国家的情况比较理想，社会转移后大都在个位数，包括经济水平较差的希腊及葡萄牙。例如，德国由 80.5% 降至 9.6%，挪威由 71.4% 降至 4.4%，丹麦由 59.0% 降至 3.0%，希腊由 77.9% 降至 7.9%，葡萄牙由 80.3% 降至 9.5% (表 2)。

4.2 美国的贫穷情况

美国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的 Rachel Sheffield 及 Robert Rector (2011) 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贫穷报告，指出 2010 年美国约有 4,620 万人属于贫穷人士。他

表 2：经合组织国家于社会转移前后的相对贫穷率，2016 (%)

国家或地区	社会转移前后		65 岁或以上社会转移前后	
	转移前	转移后	转移前	转移后
澳大利亚	25.2	12.1	64.9	23.2
奥地利	32.2	9.8	82.7	8.8
丹麦	24.6	5.8	59.0	3.0
德国	32.7	10.4	80.5	9.6
希腊	33.3	14.4	77.9	7.9
日本 (2015)	33.0	15.7	64.1	19.6
韩国	19.8	17.6	58.7	45.0
挪威	25.6	8.2	71.4	4.4
葡萄牙	32.9	12.5	80.3	9.5
瑞典	24.9	9.1	66.3	11.0
英国	29.5	11.1	58.8	14.2
美国	26.6	17.8	57.1	22.9

资料来源：OECD.Stat (2020)。

们将这批穷人的生活方式作出整理，显示出另一种富裕经济体的贫穷特殊面貌：

- (1) 80% 的贫穷住户拥有空调，而 1970 年时全美人口只有 36% 拥有空调；
- (2) 92% 的贫穷住户拥有微波炉；
- (3) 约三分之二拥有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
- (4) 近四分之三拥有汽车或货车，31% 甚至有两辆或以上；
- (5) 美国的贫穷人士比一般的瑞典、法国或英国非贫

穷人士拥有更大的居住空间——美国 2015 年平均新建住宅单位面积为 2,687 平方呎，而 1973 年只有 1,660 平方呎（Perry, 2016）；

- (6) 96% 的贫穷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没有感觉到饥饿。

一般印象中，贫穷与饥饿相关联，但是美国的穷人却有很大机会患上肥胖症。根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的数字，2011 至 2012 年，20 岁或以上的美国成人患有肥胖症（即身高体重指数达到 30 或以上）的比例为 35%（Gonzalez-Campoy, 2019）。穷人更易食用高卡路里的“垃圾食物”，患有肥胖症的机会更大。美国统计局一项研究发现，贫穷率超过 35% 的郡，患有肥胖症人士的比例是富裕郡的 1.45 倍（Levine, 2011:2667）。

4.3 中国香港的贫穷情况

2013 年，香港特区政府开始以相对贫穷线来量度香港的贫穷人口，用的标准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若以市场收入计算，香港的贫穷率约在 20%；但经过 2015 年政策介入即社会转移，贫穷率便跌至 15% 左右，贫穷人口由约 130 万减至约 100 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2）。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有两个负面因素影响——人口老化及家庭人口减少（小家庭化）抵消了政府政策的正面作用。

若用上述布里斯托大学学者 Gordon 设计的八项绝对贫穷指标来猜想，香港应没有绝对贫穷问题。从香港贫穷人口的开支模式来看，这便再清楚不过。举例说明，2015 年贫穷线以下的住户用于住屋及食品的开支分别是 39.7% 及 31.4%，与全港住户的平均水平差别不算很大，后者分别是

35.6% 及 27.7%。况且，贫穷住户开支中有 15.8% 用于外出用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4-5）。

香港是富裕社会及国际社会指标的领头羊。2017 年，香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84.1 岁，位列全球第一；人类发展指数是 0.933，与瑞典同列第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22）；人均本地居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为 46,390 现价美元（World Bank, 2020b）。我们不能说香港的贫穷人口生活没有困难，只是香港缺乏类似欧盟的物质匮乏数据。但若从上文提及的贫穷住户的住屋及食品两大类基本需要开支模式来看，他们与一般住户的差距不算太大。我们可以说，香港穷人面对的困境是源于生活方式相对落后于一般期望。

4.4 中国大陆的贫穷情况

中国喜欢用恩格尔系数量度贫穷。2017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大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29.3%，其中城镇居民为 28.6%，农村居民为 31.2%；而 1978 年的相关数字分别为 63.9%、57.5% 及 67.7%（中国政府网，2018）。看来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大部分居民都有六、七成开支用于食物等必需品之外。

不过，中国官方的贫穷量度仍然采用绝对贫穷线的标准。2011 年底，中国政府决定将贫穷线标准从每年 1,274 元人民币（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 80% 至 2,300 元人民币（2010 年不变价），并以之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中国政府网，2011），即国家贫穷线（national poverty line）或称行政线（administrative line）。中国政府这个新标准大致与世界银行每天 1.25 美元（2005 年）的标准接近。以 2,300 元人民币来估算，2012 年末中国大陆农村贫穷人口为 9,899 万人；

而到了 2018 年末，中国大陆农村贫困人口估计只有 1,660 万人，贫穷率为 1.7%（中国政府网，2019）。

而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天生活费 1.90 美元（2011 年购买力平价，约等于 7.3 元人民币）的标准计算，2015 年中国大陆贫困人口只有 960 万，占总人口的 0.7%。若用适合于中低收入国家的 3.20 美元的贫穷线（2011 年购买力平价，约等于 12.2 元人民币计算），中国大陆穷人有 9,600 万，占总人口的 7.0%（World Bank, 2020c, 2020d）。

2017 年，中国大陆人均本地居民总收入为 8,740 现价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经济水平分类，中国应属中高收入国家（标准为 3,896 至 12,055 现价美元，三年平均值）。若按中高收入国家每天 5.50 美元（2011 年购买力平价，约等于 21 元人民币）的标准计算，中国大陆穷人有 3.7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7.2%（World Bank, 2020a, 2020c, 2020d, 2020e）。

5 可否消灭贫穷？

通过以上对贫穷的历史演变、概念界定和测量的梳理，我们认为无论是绝对贫穷还是相对贫穷，概念和量度标准的变化都影响了对“可否消灭贫穷”问题的回答。

5.1 相对贫穷

首先我们处理消灭相对贫穷的问题。我们认同 Townsend 对贫穷的社会学分析，即“贫穷相对性的绝对性”。贫穷不仅要从客观的角度去界定，其定义中还应包含以他人或其他社群为参照所感受到的被剥夺程度，即含有主观因素。

但若遵从 Scitovsky 对贫穷的观察，贫穷已完全变成是“尊严的最低社会标准”，那么即使经济富裕亦不容易解决相对贫穷，因为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这一点从欧盟对相对贫穷的定义和测量可见一斑。欧盟近二、三十年随着经济发展，贫穷的量度慢慢改变为对社会生活方式相对平等的关注，相对贫穷线或贫穷风险线的订立体现了欧盟的这种关注。因而即使是像北欧的瑞典及挪威等经济如此富裕的国家，在 2016 年亦分别有 9.1% 及 8.2% 的相对贫穷率（表 2）。需要注意的是，若将富裕社会的相对贫穷问题理解为纯粹的不平等的生活方式，则这种贫穷不容易消灭，但不容易并不代表不可能。若以经合组织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五成为切线，一些重视再分配的国家如北欧的丹麦及瑞典是可以做到的。首先，这些国家通过慷慨的社会转移将贫穷率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若再计入住户资产及社会服务的货币价值，这些富裕国家的贫穷人士实际上已经脱离相对贫穷。

更进一步，若将相对贫穷的概念加上一个生理性的“绝对”核心内涵，那么在富裕经济体消灭相对贫穷更是有可能的。欧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 2009 年开始用物质匮乏作为量度相对贫穷的补充，欧盟不少国家都因而得到不错的成绩。其中丹麦的表现最为突出，5.8% 的相对贫穷率已经十分接近消灭贫穷（表 2），因为相对贫穷线还没有加入对住户资产及使用的社会服务价值的量度。整体来说，在富裕经济体，贫穷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这些地方的绝对贫穷问题已经基本得以解决。因此，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后，就算南欧诸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三、四成，这些国家也只爆发了零星的城市青年暴动。总括而言，若高收入国家在相对贫穷线之外加上物质匮乏的指标，消灭相对贫穷的机会会变得更大。

5.2 绝对贫穷

接下来我们讨论消灭绝对贫穷的问题。Sen (1983) 认为贫穷含有一个不可缩减、不容忽视的“绝对”核心内涵，例如饥饿。就算抛开饥饿去看贫穷的其他方面，其绝对性的一面也没有消失，一个社会成员处于贫穷状态的事实，并不会因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景况如何而得到改变，这个绝对的核心内涵就是生存线。

即使如此，能否消灭绝对贫穷依然取决于量度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一天 1.90 美元”的标准计算，2015 年全球只有 10.0% 的人口（约 7.36 亿人）收入低于这条国际贫穷线，而且他们大多居住于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发达国家只占很小比例（Wadhwa, 2018; World Bank, 2018），因此若按照此贫穷线来测量贫穷，发达国家的贫穷现象是可以被消灭的。同样道理，中国如果按照“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基本生理性脱贫目标要求，满足贫穷群众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并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使其得到基本保障，那么，2020 年中国是能够成功消灭绝对贫穷的。

但绝对贫穷如果按照更高的标准来测量，则很多地区又会陷入贫穷。根据世界银行于 2017 年底提出的两条美元价值较高的贫穷线，若以中低收入国家“一天 3.20 美元购买力平价”为测量标准，2015 年全球人口（73.55 亿）的 26.3%（19.33 亿）为穷人；若以中高收入国家“一天 5.50 美元购买力平价”为标准，则全球 46.0%（33.87 亿）的人口为穷人（World Bank, 2018:83）。若以后者为标准，即使很多发达国家仍会存在大量贫穷人口。

由此可以发现，量度标准的不同影响对“可否消灭绝对

贫穷”问题的回答。世界银行意识到这一问题，因而还设计了一条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的社会贫穷线（societal poverty line）。尽管各国在测量贫穷的方式上存在系统差异，但全球贫穷计算是基于固定的切线值。社会贫穷线汇总计算了699个国家贫穷线，以“一天1.00美元”作切线计算绝对数值，再加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中位数或消费的一半（代表相对于该社会的平均生活方式）。与其他的相对线相比，社会贫穷线与各国对贫穷的定义更加一致。世界银行表示，一般来说，这条贫穷线高于“一天1.90美元”的国际贫穷线。以社会贫穷线计算，2015年低收入国家的贫穷线应是2.20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为2.90美元，中高收入国家为5.8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为21.20美元。以此再计算贫穷人口比率，2015年低收入国家为51.2%，中低收入国家为32.9%，中高收入国家为23.5%，而高收入国家为16.3%（World Bank, 2018:73-77）。根据社会贫穷线的计算方法，全球的贫穷规模自1990年来稳步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绝对贫穷人口规模的下降速度（Jolliffe and Prydz, 2017）。可见，“一天1.90美元”的国际贫穷线只可以量度低收入国家，但难以量度中低或中高收入国家的贫穷水平。而社会贫穷线的设计便是将相对与绝对贫穷测量整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欣赏的做法。

5.3 贫穷可否消灭？既是分配政策，也是量度问题

本文发现绝对贫穷具有一个“绝对”的生理需求标准，由于这个标准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方式转变而发生变化，能否采用适宜的量度标准影响了对绝对贫穷规模的计算。相对贫穷如果理解为纯粹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否平等，那么是不容易消灭的，但若同样赋予其一个“绝对”的生理需求标准，那么相对贫穷也是可以消灭的。贫穷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因而不应一刀切地设定贫穷量度标准，应根据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标准设定。

尽管概念界定和量度标准影响了“可否消灭贫穷”问题的答案，但这一问题本质上还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政策的考量，而不是一道单纯的测量方法上相对主义的诡辩题。分配政策方面，并不需要多加以讨论。本文比较了不同国家的贫穷率数据，发现北欧诸国如丹麦、挪威或瑞典在减低相对贫穷的成绩有目共睹。这归功于它们的高税率和再分配政策，以及在市场工资保障方面的制度设计。

但从技术角度来讲，选择适宜的量度标准的确影响了对“可否消灭贫穷”问题的回答。这分为两方面，其一是需要选择用货币单位抑或是多维度社会指标来量度，其二是需要意识到两者都有一个切线武断的问题。

世界银行于1990年综合六个最贫穷国家的国家贫穷线，得出“一天1.00美元购买力平价”的绝对贫穷线，随后基于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而调整三次。这种标准简单易懂，但无论是1.00美元还是1.90美元，都不可能量度到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与地区的贫穷规模。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用国际绝对贫穷线测量尚且可以；但对于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只有加入符合实际情况的物质匮乏指标，才能得知更加确实的贫穷面貌。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分析（Sheffield and Rector, 2011），便展示了一幅颇为难于从生理性需要理解的美国贫穷面貌。此外，对于地域广大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先后所展现的贫穷面貌又有所不同。所以，用什么量度及如何设定切线以应对多样性及多层次的社会现实，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例如，以“一天1.90美元购买力平价”来量度中国沿海地区的贫穷规模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不应一刀切地设定消灭贫穷的量度标准；应该将消灭贫穷的目标及其量度标准细分。我们提出两个选项。第

一，以世界银行的国际绝对贫穷线为最低标准，辅以物质匮乏指标，相互参照。第二，以世界银行的社会贫穷线为最低标准。理论上两条国际贫穷线都含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内涵；但后者标准较高，较为适合富裕经济体。基于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至文化及价值的差异，还有各国内部各种差别，我们认为找到一条没有层次的国际贫穷线以客观地量度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贫穷人口规模是不太可能的。

6 结论

本文通过描述近二百年来全球贫穷面貌的变化，解答“贫穷可否消灭”的问题。我们有五点总结。

第一，贫穷面貌，既是表徵，亦是本质。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生活在工业城市的穷人容易陷于生存危机——童工在工厂被剥削，成年人存在“缺乏耐力、肌肉发育不良、贫血”等健康问题，还有饮用水安全、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踏入二十一世纪初，生存型的绝对贫穷仍未能杜绝。学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贫穷面貌的描述中，居然包括家庭“丧失两位或以上的儿童”以及“至少一位家庭成员严重营养不良”等极端生存问题。当然，在十九世纪，除了开展工业革命的少数国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然停留在农耕的自然经济阶段，生存条件可能更差。由于数据所限，我们并未描述这些地区当时的贫穷面貌，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但是，通过跨时空对比，两个典型地区——一个当年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力也最强大，另一个今天生存条件最恶劣，贫穷人口最多——都凸显类似的贫穷面貌，即生命受到损害并有机会丧失生命。

第二，贫穷概念和量度标准的变化影响了对贫穷面貌和规模的认识。如 Townsend 教授所言，贫穷概念是动态变化的。绝对贫穷是多维度的，不仅限于生理性需要。今天，即使是量度“一无所有”的赤贫现象，亦需加入功能性内涵，例如教育及基本资产。从欧盟及经合组织等富裕经济体量度贫穷的指标，以及背后学者有关贫穷的相对性辩论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相对贫穷量度的不是贫穷，而是社会不平等，这是概念性质的变化。美国穷人表现出来的面貌则完全违背了对贫穷的传统认知：穷人理应陷于饥饿或营养不良，但他们却由于进食过度或热能过量而患上肥胖症。不过，无论如何，贫穷概念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内涵——未能满足此核心内涵会导致生理损害以至死亡。若完全采纳相对主义的概念及量度方法，将损害无限扩展，纳入个人期望、尊严等主观面向，那么贫穷不会由于经济发展而被消灭。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第三，只有进行跨时空比较，才能辨别传统意义上的贫穷与富裕社会中社会生活方式匮乏的“贫穷”之间的差别。当我们进行跨时空比较，便会察觉历史上某个特别时段，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与今天地球上最贫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着相同的贫穷面貌，即穷人面临极端生存威胁。若进行横向比较，即将今天的富裕经济体与地球上最贫穷地区进行比较，又会发现贫穷概念和量度标准的转变。对于生活在富裕社会的民众来说，由于生活拮据、入不敷出而主观感觉身陷贫穷是可以理解的，因而量度贫穷使用了相对贫穷线；这完全符合民情社情。社会科学有不少跨地域研究，但从历史角度切入的跨时间比较是较少的。这种方法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对我们避免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帮助。

第四，全球资源配置不均造成当今世界的贫穷面貌差

异。一方面，富裕经济体的贫穷面貌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美国的穷人患上肥胖症的机会比一般人高，居住的空间甚至比一般的欧洲国家居民的更大。另一方面，生存型的绝对贫穷在今天的欠发达地区仍然挥之不去。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约二亿人口处于“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甚至有儿童因贫穷而死亡。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分配问题，更是全球人类共同体需要面对的公平问题。

第五，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贫穷标准和反贫穷政策，对贫穷概念的理解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要消灭贫穷，落后国家及地区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对贫穷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及定力，不要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欧盟的贫穷风险线量度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社会不平等。这类指标不能用于量度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面貌和规模。在消灭贫穷的问题上，中低收入国家的后发优势是回归基本，重视贫穷的绝对生理性。

对贫穷面貌作跨越时空比较，我们看到不变的一面是绝对的生理及生存性贫穷仍然存在，变的是对贫穷的理解加入了社会规范或尊严等相对主观标准。这对发展中国家如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在贫穷问题方面的研究及解决方案有重要启示，也就是如何管理社会期望的议题。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需要经历一定历史过程，但人类的欲望无穷。因此，如何界定贫穷，最终要回归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哲学层面。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优势。传统中国文化对物质贫穷并不鄙视，鄙视的是不劳而获的心态。从这个文化角度思考解决贫穷问题，才会得出符合国情的方案。

参考书目

- 中国政府网。2011。〈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详解 2300 元扶贫新标准〉，12 月 2 日。http://www.gov.cn/jrzg/2011-12/02/content_2009471.htm。
- 中国政府网。2018。〈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8 月 3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8/31/content_5319211.htm。
- 中国政府网。2019。〈2018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人〉，2 月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2/17/content_5366306.htm。
- 央视网。2018。〈数说改革开放 40 年：40 年减贫 7.4 亿人〉，12 月 10 日。<http://news.cctv.com/2018/12/10/ARTISzd4ekNLNB88EFFtMgB7181210.shtml>。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贫穷线辅助分析：2015 年贫穷住户的开支模式》。[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expenditure_patterns_of_poor_households\(30.12.2016\)_final.pdf](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expenditure_patterns_of_poor_households(30.12.2016)_final.pdf)。
- 联合国。2020。〈世界人口日〉。<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world-population-day>。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2018 年统计更新》。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_human_development_statistical_update_cn.pdf。
- Alkire, S. & J. Foster. 2008.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xford: OPHI Working Paper No. 7, University of Oxford.
- Alkire, S. & B. Housseini. 2014.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 Levels and Trends." Oxford: OPHI Working Paper No. 81, University of Oxford.
- Atkinson, A., L. Rainwater & T. Smeeding. 1995.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uropean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Working

- Papers in Economics 9535,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Booth, C. (ed.). 1892.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Volume 1). London: Macmillan.
- Bourguignon, F. & C. Morrisson.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4):727–44.
- Cartwright, F. F. & M. D. Biddiss. 2004. *Disease and History* (2nd edition).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 Cruz, M., J. Foster, B. Quillin & P. Schellekens. 2015.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nd Sharing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Policy Research Note PRN/15/03, World Bank.
- Decancq, K., T. Goedemé, K. Van den Bosch & J. Vanhille. 2013.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ncepts, Measurement and Data." Antwerp: Methodological Paper No. 13/01, Poverty Reduction in Europe: Social Policy and Innovat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Joint Report on Social Inclusion 2004*.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Eurostat. 2020a.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Database: At-risk-of-poverty Rate by NUTS Regions (ilc_li41)," 30 July.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income-and-living-conditions/data/database>.
- Eurostat. 2020b.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Database: Severe Material Deprivation Rate by Income Quintile and Household Type (ilc_mddd13)," 30 July.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income-and-living-conditions/data/database>.
- Fried, A. & R. M. Elman (eds.). 1969. *Charles Booth's London*. London: Hutchinson.
- Gonzalez-Campoy, J. M. 2019. "Obesity in America: A Growing Concern." <https://www.endocrineweb.com/conditions/obesity/obesity-america-growing-concern>.
- Gordon, D. & S. Nandy. 2012. "Measuring Child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A. Minujin & S. Nandy (eds.), *Global Child Poverty and Well-being: Measurement, Concepts, Policy and Action*.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pp. 57–101.

- Gordon, D., S. Nandy, C. Pantazis, S. Pemberton & P. Townsend. 2003. *The Distribution of Child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https://www.ibge.gov.br/poverty/pdf/Social%20Exclusion/REFERENCE%20CHILD%20POVERTY%20REPORT.pdf>.
- Hickel, J. 2015. “Could You Live on \$1.90 a Day? That’s the 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The Guardian*, 1 November.
- Jolliffe, D. & E. B. Prydz. 2017. “Societal Poverty: A Relative and Relevant Measure.” Washington, DC: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073, World Bank.
- Levine, J. A. 2011. “Poverty and Obesity in the U.S.” *Diabetes*, 60(11):2667–68.
- Morgan, J. E. 1866. *The Danger of Deterioration of Race from the Too Rapid Increase of Great Citi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Niessen, M. 1982. “Qualitative Aspects in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M. Niessen & J. Peschar (eds.),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ory, Methodology and Organisatio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Oxford: Pergamon Press, pp. 83–104.
- OECD.Stat. 2020.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By Country – Poverty,” 20 July.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599>.
- Orshansky, M. 1969. “How Poverty Is Measured.” *Monthly Labor Review*, 92(2):37–41.
- Perry, M. J. 2016. “New US Homes Today Are 1,000 Square Feet Larger Than in 1973 and Living Space Per Person Has Nearly Doubled,” 5 June, AEI. <https://www.aei.org/carpe-diem/new-us-homes-today-are-1000-square-feet-larger-than-in-1973-and-living-space-per-person-has-nearly-doubled/>.
- Roser, M. 2016.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lobal-economic-inequality>.
- Roser, M. & E. Ortiz-Ospina. 2013. “Global Extreme Pover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poverty>.
- Rowntree, B. S.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 Scitovsky, T. 1978. *The Joyless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83. "Poor, Relative Speak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 35(2):153–69.
- Sen, 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ffield, R. & R. Rector. 2011. "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rprising Facts about America's Poor." Washington, DC: Backgrounder No. 2607,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Townsend, P. 1962. "The Meaning of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3(3):210–27.
- Townsend, P. 1985.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Amartya Se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7(4):659–68.
- United Nations. 1995.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openhagen Declaration on Social Development."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CONF.166_9_Declaration.pdf.
- United Nations. 2015.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New York: UNDP.
- Wadhwa, D. 2018. "The Number of Extremely Poor People Continues to Rise in Sub-Saharan Africa."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umber-extremely-poor-people-continues-rise-sub-saharan-africa>.
- World Bank.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0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3. *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1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8.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20a. “World Bank Open Data: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CN>.
- World Bank. 2020b. “World Bank Open Data: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Hong Kong SAR,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HK>.
- World Bank. 2020c. “World Bank Open Data: Population, Total –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locations=CN>.
- World Bank. 2020d. “World Bank Open Data: Poverty and Equity Data Portal – China.” <http://povertydata.worldbank.org/poverty/country/CHN>.
- World Bank. 2020e. “World Bank Open Data: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by Income in XLS Format.”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可否消灭贫穷？

近二百年来贫穷面貌的变化

摘要

本文从过去二百年的时间维度梳理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概念及量度标准的历史变化，比较全球贫穷面貌的变化，并探索“贫穷可否消灭”这一重大问题。本文发现绝对贫穷具有一个“绝对”的生理需求标准；能否采用适宜的量度标准影响了对绝对贫穷规模的计算。相对贫穷如果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生活方式不平等，则不容易消灭；若同样赋予其一个“绝对”的生理需求标准，便也可以消灭。贫穷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进行标准设定。

Can Poverty be Eliminated?

Changes in Poverty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Kai LIU and Chack-kie W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past 200 years,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global poverty landscape, and explores the major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poverty can be eliminated. It finds that absolute poverty involves an absolute standard of physiological demands; whether or not an appropriate method of measuring absolute poverty is adopted will affect the calculation of an absolute poverty scale. Relative poverty is not easy to eliminate if it is understood purely in terms of social inequality. But if it is also measured according to an absolute standard of physiological demands, then relative poverty can also be eliminated. Poverty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Therefore, poverty measurement standards should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HKIAP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Fung, Anthony Ying-him, PhD (Minnesota),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ssociate Directors:

Hong, Ying-yi, PhD (Columbia),
Choh-Ming Li Professor of Marketing

Ng, Mee-kam, PhD (UCL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Zheng, Victor Wan-tai, Ph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ociate Director (Executive), HKIAPS

ISBN 978-962-441-243-7



9 789624 412437